

肥城文史資料



第三輯

本辑编辑：李树真、王延生、傅志亭、杨秋黎

肥 城 文 史 资 料

第三辑

(内部资料)

目 录

- 回忆抗战初期肥城的统战工作 徐麟村 (1)
战斗在肥城的岁月 尚伯权 (4)
李森堂烈士抗日事迹简述 田文鑫 孙勋业 (10)
战斗在日伪鼻子底下的抗日堡垒
——尚德镇镇公所 李恒岱 (13)

随吴化文将军起义前后 张国卿 (20)
我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期 李瑞霆 (30)
刚直不阿 为国为民
——记李瑞云二、三事 司甲辰 (41)

在美华人争取民权的一大胜利
——我在美国遭遇的一起停车事件始末 赵培华 (45)
一个华籍日本人的自述 吉田佐津子 (李福云) (67)

虎门转移 肥政文 (70)
棋石岭阻击战 刘天民 (72)

回忆泰运区抗日回民学校 陈宝阳 (75)
肥城医事录 秦继昌 (80)

《古兰经》朝觐和伊斯兰教节日	杨启勤	(84)
我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教育工作简介	赵君玉	(92)
维持会长范维新	孙汉杰 司甲辰 杨秋黎	(97)
国民党新五军途经我村的情况	孙勋业	(104)
韩复榘追剿刘黑七匪帮经肥城的情况	展广植 赵奉兰	(107)
肥城桃园公社(诗一首)	钱昌照	(142)
蔡元培为葛云庵题碑	张诗平	(108)
肥城钱庄始末	肥政文	(113)
简述《八卦奇门枪》	杨惠芳	(116)
民国以来在肥城地区流通过的货币	肥政文	(119)
肥城老城的石城墙	王庆丰	(121)
关于肥城县道会门有关情况简介	展广植	(123)
范蠡栖陶的传说	陈吉甫	(133)
我国史书的种类	傅志亭	(122)
读《文史》有感	王田银	(103)

回忆抗战初期肥城的统战工作

徐 麟 村

我于一九三八年任肥城县委书记。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期，我们以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针，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开展工作的。

我们首先做的工作是，发动和团结肥城县教育界上层爱国人士，利用他们在肥城教育界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地位、关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同仇敌忾，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党的统战政策的感召下，为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有的参加了革命队伍，献身于革命事业。教育界知名人士李秋坪（即李元凯、西付村人）、郝鼎臣（五区杨家庄人），曾分别担任我抗日民主政府的二科科长和县动委会的秘书。原肥城教育界的上层人士葛阳斋（安临站小学校长）、赵宝衡（王晋小学校长）、李森堂（县教育科督学）、王冠五（张家店小学校长）、刘心斋（肥城教育科督学）等人，他们分别担任了自卫团的付主席、肥城二区区长、五区区长和肥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六区区长，以及肥城九区办事处三科科长等职务。这些同志都为肥城政权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如赵宝衡、李森堂）。

我们在大抓教育界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利用亲戚、朋友、同志、熟人，亲联亲、故联故等等关系，开展了对开明士绅，地方势力派以及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我们紧紧掌握民族矛盾是当时主要矛盾这一特点，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武器，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

在工作中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主张抗日，但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只要抗日，我们就团结他，原国民党三区区长刘义三就属于这种类型。

在抗战初期，我们在肥城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开明士绅刘继河，为抗日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参加工作后，加入了组织，为革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乔绶卿（原三区刘义三以前的区长），在三区对发展和组织自卫团第三大队，做了很多工作，曾自筹经费组织游击队，参加工作后曾任专署的税务局长。曾在旧军阀部队当过营长的马荣久（即马永余，肥城西马庄人），曾任我抗日民族政府保安大队的付中队长，被敌逮捕后，慷慨就义于肥城县城，人民政府给以革命烈士称号。就以肥城有名的劣绅孔和亭（肥城四区孔庄人）及其亲家（儿女亲家）原四区区长王冠州，在抗日初期，都为抗日救国运动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四区上固留村的董羽生，曾在旧军队当过营长，抗战初期也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总之，在抗日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团结肥城上层人士共同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对基层乡、镇政权的改造，我们也十分注意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抗战初期，肥城县共约有六十个左右的乡、镇政权，乡、镇长绝大部分是国民党员，又是广大农村的直接统

治者。对这些基层政权的改造，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操之过急。我们提出：凡是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的；坚决主张抗日，执行抗日民主法令的；在农村没有明显劣迹的，都一律留任，继续担任乡镇长，否则，即进行改造，另选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担任。实践证明，我们的做法既稳定了大多数人的情绪，又调动了那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乡、镇长的积极性，把个别最坏的孤立了起来。屯头镇镇长喻岱衡，年纪虽比较大，主动为我们军队解决粮食供应的困难。五区尚德镇镇长李敬轩、家庭系地主（开明地主），能很好地完成我抗日民主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在这一方针下，随着区一级政权和区动委会的建立，对乡镇政权基本上进行了改造，也为驱逐国民党顽固派县长田家滨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摘自徐麟村回忆录》

礼炮为何二十一响

一国元首到另一国正式访问，通常要鸣放二十一响礼炮表示欢迎。这个习惯最先起源于行驶在海上的战船。当一个国家的战船进入另一个国家的港口时，便自动放空炮，表示没有敌意。从前的战船容积小，船上装炮最多不过七门，当一个国的战船到达另一国的港口访问要鸣放礼炮时，只能一门跟一门地放，七门炮都放空就没有了。而对方港口的炮台一般都以三倍为答谢，即鸣炮二十一响，表示欢迎。久而久之，这种习惯便成为国际通例，并不只限于海军舰只进港时应用，而是在各种盛大的庆祝场合和迎宾场合经常用的一种礼节了。

傅志亭 编

战斗在肥城的岁月

尚伯权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当中，肥城县占有显著位置。从地理上看，肥城是泰肥山区的中心，泰肥山区是泰西三大山区的中心，肥城又靠近战略要地济南。所以，对敌人来说，肥城的战略地位，都是很重要的。1937年山东沦陷前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派了不少同志到这个地区进行抗日活动。1938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驻肥城地区，肥城一带的抗日局面空前活跃。我就是在这股抗日洪流中，随同共产党员于会川同志，来到肥城县，从事抗日活动的。

1927年2月，我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北平分校，毕业后在东北军任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我们东北军的热血青年非常气愤，随即脱离了东北军，参加了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1936年初，我从河北宣化到山东菏泽68军兵战部与东北讲武堂北平分校同学共产党于会川、周持衡等建立了联系。于会川同志派我到郓城县干部训练大队部任训育主任。于会川同志则被国民党聊城专员范筑先提名任肥城县县长，并由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任命。1938年4月于会川正式担任肥城县县长，不久，于派人通知我来肥城工作。

一、出任肥城县公安局长

我在菏泽接到于会川的通知后，马上打点行装，赶来肥城。在肥城四区张庄找到于，他让我先负责征收粮食，了解情况，并搞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联系地点在演马庄、张庄。当时县政府刚刚成立，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取信于民，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肥城的抗日武装。在县政府工作的人员有张辛田、张历、斗秀岩、乔学木、桑寿山、郭月斋、师文斌、阴法唐等，其中还有任重华、孟繁九、孟繁十、王桂英（即王继川）、徐杰等几位女同志。于会川同志身旁的特务员有解广仁、张传何同志。这一时期，县大队已经组建起来了，于会川兼大队长，下设五个中队，一个特务连，各中队领导人有刘继河、郭月斋、李志泰、李建一、马荣九、王连楷、吴德全、张历、桑寿山等人。这样于会川同志将分散的武装，组织成为有相当实力的抗日武装。1938年7月，我被任命为肥城县抗日政府的公安局长。当时县政府刚刚成立，公安局随同县大队开展工作，主要是搞军事工作。不久，县大队改编为“山东第六专区第十七支队”，于会川为司令员，刘继河为副司令员，我任副官长。这段时间，我党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我仅知道于会川是共产党员，是利用国民党的“正统”旗号组织我们的抗日武装。1938年10月，八路军进入山东，于会川同志主动联系，带着他创建的这支武装很快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三团”，团长于会川，副团长刘继河，我任后勤主任。团以下设三个营，一营营长郭月斋，二营营长张辛田，三营营长张维之，阴法唐任宣传员。当时，六支队司令员是刘海涛，政治委员张北华，泰西特委书记董（段）君毅，六支队政治部主任李冠元，参谋

处长马继孔，供应部主任程重远。1939年5月，部队整编后，于会川调任六支队参谋长，我任六支队第四科科长。

二、争取田家滨的部队

1938年9月，国民党新派泰西专员郁仁智来到肥城，得知肥城县县长于会川是共产党员，为培植自己的势力，撤了于会川的职务，派来他的亲信田家滨任肥城县长。不久，田家滨也拉起了一支武装，编为国民党山东保安旅。田家滨是国民党的顽固派，其部当时驻肥城五区南尚任和演马庄一带，由于他们是由地痞、恶棍组织起来的一批污合之众，纪律涣散、为非作歹，骚扰群众，搞得民不聊生，不但不积极抗日，还专门与我争夺地盘，搞摩擦。对其应该怎么办？周持衡同志提出我们要贯彻党的政策，加强统战工作，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对田家滨应该采取教育、团结的政策。争取工作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对田家滨本人，帮助他认清国共应携手合作，一致抗日。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责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叫嚣，是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相悖的，是不得人心的。现阶段只有共同抗日才有出路，抗日还要依靠团结群众，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亡国奴。另一方面是对田部的宣传教育工作，教育他们认清敌友，不能以友为敌，枪口对内打自己的人，教育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抗击日寇，人人有责，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段时间，我就是受组织的派遣作对田部的教育工作，当时的联络点是肥城四区演马庄邮政局师文斌家。为了宣传我党的政策，教育这支部队，我打入进去，利用这支部队内部的矛盾，宣传形势和我党的政策，使他们认识当兵不是为某个人效力，

而应该是救国救民。国难当头，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就是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生存，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经过耐心的宣传教育，田部思想有些变化，与我的磨擦小了，扰民的事件少了，有时还能与我部合作接受我们的领导，使肥城这块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壮大。后来田部与我对抗，被我击溃，这是后话。

三、陆房战斗中的支前工作

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率领东进支队来到肥城，驻在肥城四区徐坍庄以及附近各乡。八路军带来了老红军的作风，纪律严明、态度和气、秋毫无犯，凡是和部队接触过的，都赞不绝口，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八路军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抽出得力干部组成工作团，帮助建立人民政权，发展地方人民武装，使肥城出现空前活跃的抗日局面。

八路军到来以后，我利用各种形式和方法积极向人民群众宣传大好形势，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动员工作，同时密切配合部队的军事行动。日寇把肥城的八路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9年5月的一天分九路从四面八方向我根据地包围过来，把我东进支队、地方干部、地方武装围困在陆房一带。形势紧迫，陆房战斗在即，当时，我担负的任务是支前工作，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保证作战部队的作战物资和给养的供应，动员爱国青年参军参战。在当时条件下，完成这样的任务是比较艰巨的。那时年纪较轻，精力旺盛，有股不怕困难，不辞辛苦的劲头，特别是当地的人民群众看到部队指战员在战斗中奋勇杀

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抗日热情很高，全力支援，各级组织密切配合，热情负责，使作战的急需物资得到了及时的供应，为这次战斗的胜利创造了必要条件。部队首长陈光代师长、罗荣桓政委，对支前工作特别满意。陈光师长还亲自对我表示赞扬，称赞我们是“当代青年的骨干”。陆房战斗的胜利，使日寇企图消灭我军的阴谋破灭了。经过了战火的锤炼，抗日的烽火在肥城这块根据地越烧越旺。

四、肥城人民给我留下的深厚情意

我在肥城渡过的岁月是终生难忘的。我在肥城的大部分时间是吃住在群众家中，所做的工作也都是深入到群众中去。肥城人民待我如亲兄弟一般，他们吃苦耐劳，富有牺牲精神，关心国家的命运，爱护我们的子弟兵，经常勒紧腰带拿出好吃的、慰问我们。在那充满血腥的年代，日寇对我肥城抗日根据地多次扫荡，到处烧杀奸淫，勇敢的肥城人民，没有被吓倒，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军队和群众亲如骨肉，群众爱护干部、战士和家属的事件很多。当时，我的爱人孩子也随同我来到肥城，住在进步群众家中，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在一次敌人的围攻中，我的一双儿女（男孩八岁、女孩五岁）失散。10余天后在我部孟繁十女同志以及肥城乡亲的多方掩护下脱险而免遭杀害。当我与孩子们重新团聚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肥城人民淳朴的感情使我永志不忘，对肥城人民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我1938年6月来到肥城，1940年1月成立泰西抗日行政委员会，我奉调当科长。1940年底我调晋冀鲁豫区党委任总务科长兼生活大队长，从此离开了肥城。我在肥城的工作时间是短

暂的，但肥城人民给我留下的深厚情意是永远难忘的。我在肥城期时做过党政、地下和群众等多项工作，由于年代已久，又加记忆残缺，欢迎知情战友指正。

（杨秋黎执笔整理）

作者简介：尚伯权，东北人，1938年任肥城县公安局长，现已离休，离休前曾任吉林省交通学校党委书记等职

我国新时期的统战对象

- 1、民主党派；
- 2、无党派知名人士；
- 3、非党知识分子干部；
- 4、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官；
- 5、原工商业者；
- 6、少数民族人士；
- 7、宗教爱国人士；
- 8、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和亲友；
- 9、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
- 10、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

李森堂烈士抗日事迹简述

田文鑫 孙勋业

李森堂同志（1899—1944）出生于原肥城五区东尚里村（现属新城镇）。1937年8月参加革命，同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初期先后任小学教师、教务主任；抗日战争初期在国民党政府教育科任督学；1938年10月在肥城五区任区长，四十年代初任抗日民主政府行政科科长；1942年8月至1943年9月任肥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任县人武会付主任；1943年9月至1944年11月先后任泰西银行行长，泰运商店经理。

“九一八”事变后，这位爱国青年，积极投入抗日爱国运动，1932年8月在县立第一高小任教务主任时，利用学校这个阵地团结进步师生反对蒋介石的卖国不抵抗主义。当时，学生们最爱听国内外形势，他就利用这一特点向学生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及蒋介石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激发了学生抗日反蒋的情绪。当时该校有位讲授国民党《党义》教员张文德经常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言论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于是李森堂同志便发动学生干部张新村、李志华带领广大爱国学生期末罢考《党义》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公开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卖国政策及肥城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剥削压迫乡里的罪行。在校内把斗争矛头指向反动校长李香坡，并要求

撤换他。

1933年新学期开始，学校令每个学生缴学杂费1元2角，学生们非常不满。李森堂便告诉学生自治会主席张新村：“县立学校都有这笔款，学校这是无理摊派，这是校长自己巧立名目，贪污自肥。”于是，学生们在李森堂同志的秘密支持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李香坡贪污的斗争，迫使李香坡向学生公开作检讨并退回了学杂费。从此，李香坡再也不敢公开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了。李森堂同志为了让学生看进步书籍，还与张维之带头为学生捐款充实学校图书馆的图书。

在这期间，李森堂同志还联络肥城进步教员、知识分子集资在肥城南门路东办了个“同乐书社”，为革命人员提供了落脚点。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他积极投入了抗日活动，他以肥城县第四科科长的名义于1937年9月组织了“抗日救国训练班”李森堂、赵宝衡、赵英斋、王英民等进步人士一起参加了学习，为山东西区抗敌自卫团培养了一批坚强的骨干。1937年10月正值日军进攻济南前夕，李森堂同志参加了张维之在王晋小学召开的进步教师集会，对发动教育界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起了积极作用。

通过实践证明，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为人民服务的，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革命成功，他在抗日艰难的岁月里于1937年9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主、民族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38年9月五区第一任区长张俊堂在敌人扫荡中不幸牺牲，李森堂同志于同年十月继任五区区长，在全县抗日救国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领头作用。

1940年2月泰西地委作出了在全区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借

粮的决定，以利解决群众生活，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当时，五区区长李森堂紧密配合区委书记刘子重，首先在东尚里发动群众，以大地主李子英为突破口发起借粮斗争。浩浩荡荡地农民群众涌入李家开展说理斗争，在群众的震慑下，东尚几户地主被迫借出粮食9万斤，大洋一万元分给了贫苦农民，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是年五月，以借粮为中心的“红五月”运动在全区形成高潮。

1941年6月22日，环境恶化，专署、县区党政机关转移，人民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当时，李森堂同志已到县政府任行政科长，县府只有曾永源和李森堂等同志留下坚持斗争，工作生活十分艰苦。

1942年8月，李森堂任肥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一直坚持和敌人周旋，机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斗争。

1943年9月，李森堂同志离开了肥城，调任泰西银行行长，从行政工作转入经济工作，为革命理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4年11月15日，在齐河牛角店不幸受伤，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45岁。

李森堂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肥城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肥城人民永远怀念他。



战斗在日伪鼻子底下的抗日堡垒

——尚德镇镇公所

李恒岱

尚德镇是民国初年沿袭下来的一个联村政区，它以尚里为主，包括附近七个自然村。

尚里当时作为肥城地区的一个抗日根据地，是有一定影响的，因此它遭受日伪的摧残蹂躏也较多，直接被日伪屠杀的干部、群众就有十二人。

1941年夏秋，日伪军大举进攻太肥山区，当时尚里进驻了两个伪军自卫团安下了据点。（先驻东尚里，后搬到白云山）。他们要成立地主政权，这时有些人想借机出头，穿上大褂走出来当官发财。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同敌人开展斗争，县委、区委在敌人占领后，分别到各村串联，正月初三便插进了沙窝村。晚上，叫去原西尚里抗日村长李恒富，南尚里抗日队长李冈影，东尚里抗日教师李子坤开会。会上，抗日区长李森堂代表县、区委动员他们三人，组织起伪尚德镇镇公所，明里应付敌人，暗中进行抗日工作，伺机打击敌人。县长吴力践还诙谐地说：“穿上灰大褂，身心仍然红，照样干红事。”根据县、区委的意见，由李恒富任伪镇长，李冈影任伪镇自卫团长，李子坤负责财粮，并研究了所有人选。这样由八位共产党员组成一个伪镇公所（炊事员、通讯员都是共产党员），形成了